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曾永義 主編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二編 第5冊

錢謙益心態與文學思想研究

鄔烈波 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二編

曾永義主編

第5冊

錢謙益心態與文學思想研究

鄔烈波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錢謙益心態與文學思想研究／鄔烈波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民 104〕

目 2+326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二編；第 5 冊）

ISBN 978-986-404-403-0（精裝）

1.（清）錢謙益 2. 學術思想 3. 文學評論

820.8 104014980

ISBN- 978-986-404-403-0

9 789864 044030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二編 第 五 冊 ISBN：978-986-404-403-0

錢謙益心態與文學思想研究

作　者 鄔烈波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5 年 9 月

全書字數 310044 字

定　價 十二編 26 冊（精裝）新台幣 4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錢謙益心態與文學思想研究

鄔烈波　著

作者簡介

鄔烈波，男，1975 年 9 月出生，浙江寧波人，先後師從江西師範大學王琦珍教授、南開大學羅宗強教授，獲文學博士學位，現任中共寧波市委黨史研究室黨史處副處長，助理研究員，參編《中國思想文化建設與發展研究叢書》、《公安廉政文化叢書》、《司法疑難案件法律適用叢書》等多部著作，發表《試論錢謙益對清代前期文學的影響》、《刑事司法權配置與附條件不起訴制度》、《論檢察一體化視野中的檢委會工作機制》等論文。

提　要

錢謙益是明清之際著名的文學家、學者、藏書家，他一生性格矛盾、思想複雜、經歷曲折，在尖銳的政治鬥爭、天翻地覆的朝代更迭、激烈動蕩的社會動亂中，他陷入道德與現實的矛盾。在他身上，人格的弱點、儒家的信條、佛道的影響、救世的理想、名利的追求、現實的苦難都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同時他以痛苦的心靈、坎坷的人生歷程、豐富的學識、廣闊的視野、轉益多師的態度創作了大量描繪時代風貌、抒寫眞情的作品，並提出許多有見地的文學觀點，對明代文學史進行了全面的總結，體現了明末清初文學與文學思想的特點，開啓了清代的詩風。他的文學思想既是時代美學精神的反映，也與其人生經歷和心態密切相關，體現他對歷史、社會現實和文學發展的認識。通過研究錢謙益的心態、文學、文學思想，我們不僅可以更深入地瞭解明清之際複雜的社會政治形勢與文壇的面貌、文學發展的走向，也可以對傳統士人的特點有更深刻的認識，並由此而思考道德與現實的矛盾、遺民的困境、士人的人格獨立、士人在亂世的使命與實際作用等問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次

引　論 …… 1
第一章　萬曆朝與錢謙益人格的形成 …… 5
　第一節　走向衰落的帝國
　　——錢謙益成長的歷史環境 …… 5
　第二節　少年錢謙益 …… 15
　第三節　初入政壇 …… 25
　小結 …… 31
第二章　錢謙益與明末社會 …… 33
　第一節　天啓朝中的錢謙益 …… 33
　第二節　崇禎朝前期的錢謙益 …… 40
　第三節　崇禎朝後期的錢謙益 …… 49
　第四節　作爲明末政治人物的錢謙益 …… 60
第三章　錢謙益在弘光朝及其降清 …… 77
　第一節　入朝 …… 77
　第二節　在朝 …… 85
　第三節　降清 …… 103
第四章　故國情懷與暮年心境 …… 119
　第一節　復明活動 …… 121
　第二節　晚年生活與心境 …… 156
錢謙益生平和心態小結 …… 179
第五章　錢謙益的文學思想（上） …… 183
　序論 …… 183
　第一節　經史爲綱 …… 189
　第二節　靈心與世運 …… 199
　第三節　對文壇弊端的抨擊 …… 215
　第四節　散華片玉 …… 232
第六章　錢謙益的文學思想（下） …… 237
　第一節　錢謙益與《列朝詩集》 …… 237
　第二節　錢謙益與《錢注杜詩》 …… 261
錢謙益文學思想小結 …… 289
餘　論 …… 303
參考文獻 …… 315
後　記 …… 325

引　論

一、問題的提出

晚明與明清之際在中國歷史中有著重要的研究價值，晚明的社會畸形繁榮與士人個性解放精神，明清之際的社會動蕩與啓蒙思想都不能不令研究者深入探究、反覆思考。尤其是在明末清初那個天崩地解的年代，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極端尖銳，內憂外患與異族入主中原對於士人的生活、心態、思想、文學等都有著重大的影響，他們隨著艱難的局勢而奮鬥、困惑、痛苦、憂傷，在他們身上，封建社會政治體制內部的矛盾、封建道德與現實利益的矛盾、個人與社會的矛盾等都錯綜複雜地糾纏在一起，導致他們的內心變化迅速、難以捉摸，中國士人的特性與優點、缺陷都得到充分暴露。而要研究明清之際的文學與歷史，就不可能避開錢謙益，因爲他在當時的社會具有重要的政治與文化地位、深遠的歷史影響，他的人生經歷與行爲、心態都有特殊而又典型的表現。通過對錢謙益的深入研究，我們可以深刻理解當時社會乃至封建社會中士人的複雜心態，並認識士人的人格及其與社會的關係。對錢謙益的認識在歷史上經過幾次起落，從中還可以考察社會的變遷：降清後，作爲黨魁、名士、才子，並曾主盟文壇的錢謙益就不斷受到譏嘲與攻擊，毀譽參半；乾隆皇帝對他進行徹底否定並查禁文集後，他似乎就從歷史上消失了；直至清朝末年，文禁漸開，錢謙益文集才再度刊行，並受到不少文人的關注。民國以來研究比較紛雜，辯護者有之，唾罵者有之，讚賞者有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由於特殊的政治環境，大陸學術界在涉及錢謙益時往往將其作爲投降派而一筆帶過。近二十年來，對錢謙益一生的是非才開始進行較爲

細微深入的探討。但是，涉及錢謙益評價的許多事實和對於這些事實的判斷，涉及錢謙益一生行事的人格特點、心路歷程、感情世界，仍然有許多需要研究的地方。

二、選題的緣由

錢謙益是明清之際黨爭中的重要人物與士人領袖，同時又是著名的文學家、學者、藏書家。他的經歷非常複雜，生平跨萬曆、崇禎、弘光、順治、康熙數朝，四次爲官，三次入獄，是明代的黨魁，南明的重臣，是降清之臣，又是抗清力量的一員；他交遊廣闊，上至帝王將相，下至書傭雜販，既有君子，也有小人，既有清朝官員，也有反清志士；他學問宏博，涉獵佛學、文學、經學、史學、金石、書畫等。對他的評價高下懸殊，有人尊之爲文壇盟主、清流領袖，有人貶之爲不齒於士林的政客、小人。不管怎樣，在他身上體現了晚明與明末清初士人的許多特點，而且他在當時的重要地位與對後世的影響是不能否認的。由他的政治活動，可以看出明末的政治格局，南明的政治態勢，清朝的復明運動與遺民的亡國哀愁；由他的文學和文學思想，可以看出當時文壇的主要面貌、文人的交遊以及文學思想的演變；由他的心態，可以分析當時遺民和貳臣複雜矛盾的內心世界與痛苦哀傷；由他的經歷，可以看出傳統文化對士人的巨大精神壓力，士人人格的優點與缺點；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個人的悲劇，遺民群體的悲劇，以至明末清初時代的悲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錢謙益的文學造詣很深，由他論文論詩的言論，由他的《列朝詩集》、《錢注杜詩》所反映的文學觀念，可以研究明代公安、竟陵、復古派文學思想向清代宋詩派、王士禎、虞山詩人等文學理論演進的中間環節，易代之際社會、心態對文學思想的作用以及錢謙益本人對於清初詩學的影響。

三、分析的思路

我認爲對錢謙益人生經歷、心態的研究是分析其文學創作與文學思想的基礎，因此以四章的篇幅對他一生的主要事件與人格、心理變化進行了較細緻的分析。這四章主要是以時間爲序，以朝代來劃分發展階段。

在具體介紹這四章內容之前，必須先解釋我對與錢謙益生平有密切關係的兩個概念內涵的界定。

一是末世情緒：所謂末世情緒就是指士人面對社會崩潰、國家衰亡所產

生的感情，如恐懼、擔憂、惋惜、哀傷、悲痛等，它驅使士人或奔走四方、圖謀振作，或花天酒地、醉生夢死，或隱居避世、視若無睹，它的核心是將個人與國家的命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社會的動蕩使他們的生活與內心發生巨大的變化，從而給他們帶來種種痛苦。提出這個概念，一方面是因爲它能較好的概括明清之際的士人心態，說明錢謙益的內心世界，同時也可以和承平時期的士人心態進行對比，將宋末元初、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士人精神風貌進行相近類比。具體說來，在明末，士人由於政治地位與文化教育的優勢，能夠及時掌握當時社會的大量重要信息，並且由於他們的學術素養與對現實的關注，能夠敏銳地察覺社會的興衰變化，所以當萬曆朝朝野上下尙一片歌舞昇平之時，他們就已經預感到末世行將到來。東林黨人的砥礪名節、積極進取是爲了救亡圖存，而思想解放思潮後期人物的風流瀟灑、沉湎享樂是因爲對現實失望。時至天啓、崇禎朝，隨著政治、經濟、軍事形勢的全面惡化，社會衰象畢露，國家的滅亡已經迫在眉睫了，士人更加緊張地呼號籌劃，企圖挽狂瀾於既倒。到了南明弘光時期，形勢危如累卵，清流或激流勇退，或錚錚自立，而小人則明白時日無多，瘋狂地攫取權力、財富，快意恩仇，進行最後的狂歡。入清後，對於逝去時代的追憶與對故國的悼念使前明士人哀慟不已。凡此種種，皆是末世之象與末世中士人的掙扎。

二是政治實用主義與道德理想主義的矛盾。所謂道德理想主義就是指以東林黨爲代表的清流試圖以正統儒家的道德要求來解決君子小人之爭，以傳統儒家的治國理念來處理君臣關係、革新政治，通過自我修養，以正心誠意達到修齊治平的目的；而政治實用主義則是指在官員分化、黨派傾軋、政治混亂的形勢下，清流爲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與個人的名利願望，在可能的條件下力求不與宦官、小人發生正面衝突，甚至與他們合作。在明末政壇上，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天啓初年東林黨與王安的協調一致，而代表性事件則是錢謙益丁亥獄事與周延儒復出。明末政治實用主義與道德理想主義的矛盾就指在崇禎朝與南明弘光時期，一部分東林黨人堅持道德理想主義，堅守君子小人之別，如劉宗周；而另一部分東林與復社中人則試圖通過政治實用主義實現道德理想主義，如馮元飈、錢謙益、張溥。吳昌時在崇禎的貪婪腐敗，錢謙益在南明弘光時期的依違隱默，都說明政治實用主義的最終失敗；而東林黨政治理想與現實成效的反差（本想改善政治，卻由於激烈的黨爭使政治更加惡化；本想通過結黨使勢力壯大，結果卻在政治上遭到小人與皇帝的打擊；

雖有高度的政治熱情，卻沒有有效的救治措施），又說明道德理想主義也最終無果而終。

在錢謙益的一生中，對快樂適意、個性張揚的追求，對建功立業、成名成家的欲望貫穿始終，這是其人格的核心；而在社會、政治層面上，他的末世情緒、在道德理想與現實利益間的搖擺又是影響其心態與行爲的主要因素。前四章正是以此爲基礎來展開。

通過四章的論述，力圖比較清楚地展示錢謙益內心的矛盾、他與社會的矛盾、明末清初時代的眾多矛盾。錢謙益正是一個經歷了朝代更替巨大變化的代表人物，在他身上體現著亂世中人的悲哀與痛苦，這不僅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文學思想中也有鮮明的體現。基於此，我以第五、六兩章對此加以探討。第五章分析其詩文集中所反映的文學思想，說明其重情性與返詩教兩條理論主線的交織；第六章則專門討論他的重要編著——《列朝詩集》與《錢注杜詩》。在這些分析中，我力求揭示其文學思想與其個性、心態、所處時代的聯繫，並探討明清之際文學思想的轉型期特徵與其中所體現的末世情緒，對錢謙益在明末清初文壇的地位進行說明。

第一章　萬曆朝與錢謙益人格的形成

錢謙益複雜的性格中既有傳統文化的積澱，也與明末的社會發展和他的成長歷程有關，因此探討在劇烈變化的萬曆朝社會中錢謙益早年的生活以及人格的形成，有助於我們理解他此後的人生選擇。

第一節　走向衰落的帝國
——錢謙益成長的歷史環境

錢謙益生於萬曆十年（1582 年），而這一年也正是萬曆朝乃至整個明代意味深長的一年。在這一年裏有兩件大事，一是張居正去世，一是皇長子出生。

張居正是明朝很有作爲的政治家，他「慨然以天下爲己任」〔註 1〕，「尊主權、明賞罰、一號令，萬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風，無所不披靡。」〔註 2〕他以考成法整頓吏治，提高了官僚機構的效率，「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爲肅」〔註 3〕；經濟上清丈田糧，推廣一條鞭法，增加了帝國的收入〔註 4〕。因此在張居正主政期間，明王朝欣欣向榮，至萬曆十年六月丙午，「太倉粟可支數年，冏寺積金不下四百餘萬」〔註 5〕。這些成果是與神宗、太后、內璫馮

〔註 1〕《明史》卷二百十三列傳第一百一《張居正傳》，頁 5645。
〔註 2〕王世貞《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七《張居正傳》。
〔註 3〕《明史》卷二百十三列傳第一百一《張居正傳》，頁 5645。
〔註 4〕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四「江南」中云：「行一條鞭法，從此役無偏累，人始知有種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買田，鄉間貧民始不肯輕棄其田矣。至今田不荒蕪，人不逃竄，錢糧不拖欠。」
〔註 5〕《神宗實錄》卷一二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保、以張居正爲首的內閣協同一致分不開的，同時也是張居正個人指揮調控的結果〔註6〕。因此當張居正一死，這種協同與成果很容易化爲烏有。事實也正是如此，萬曆十年六月張居正病逝，他死後不久，萬曆帝就對他進行清算，全家被抄，「江陵長子敬修，爲禮部郎中者，不勝拷掠，自經死。其婦女自趙太夫人而下，始出宅門時，監搜者至揣及褻衣臍腹以下，如金人靖康間搜宮掖事。其嬰稚皆扃鑰之，悉見啖於饑犬，太慘毒矣。」〔註7〕並且「詔盡削居正官秩，奪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謂當剖棺戮屍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俱發戍煙瘴地。」〔註8〕萬曆帝如此刻薄寡恩，令人心寒膽顫。所以張居正死後，明朝就再沒有一個通識時變，勇於任事的首輔。明神宗爲什麼要在張居正死後如此對待他，原因很複雜。一個可能是張居正位高權重，果決敢爲，成臣大欺主之勢，而且對神宗管束很嚴，甚至在穿衣、書法等事上也加以管教。「受遺元老，內挾母后以張威，下迎權璫以助焰，要挾聖主，如同嬰孺，積忿許久而後發，其得禍已晚矣。」〔註9〕另一個可能是萬曆帝憤恨張居正在自己面前清正廉潔，實際卻營私受賄。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便說：「年輕的皇帝感到他對張居正的信任是一種不幸的歷史錯誤。張先生言行不一，他滿口節儉，但事實證明他的私生活極其奢侈。」〔註10〕這也導致萬曆帝在此後猜疑臣下，君臣否隔。

明神宗在張居正死後，獨斷專行，聲稱：「如今用人，那一個不是朕主張」〔註11〕，但自萬曆十四年，圍繞著皇長子的地位又與廷臣發生了尖銳衝突。皇長子於萬曆十年九月丙辰生〔註12〕。萬曆十四年正月皇第三子生，進其母鄭氏爲貴妃。由於鄭氏頗受寵愛，廷臣爲之不安，擔心萬曆帝廢長立幼，二月，輔臣申時行等請冊立東宮。戶科給事中姜應麟、吏部員外沈璟上言：「貴

〔註6〕《明史》卷二百十三列傳第一百一《張居正傳》云：「居正喜建豎，能以智數馭下，人多樂爲之盡。」（頁5646）張居正往往通過個人書信對官員進行指揮，楊士聰《玉堂薈記》卷下云：「邊功之盛，莫如神廟初年，江陵柄政，一切機宜皆從書箚得之，今江陵集中可考而知也。外而督撫，內而各部，無一刻不痛癢相關，凡奏疏所不能及者，竿牘往來，罔非至計。」（頁1575）。

〔註7〕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上・卷八，頁212。

〔註8〕《明史》卷二百十三列傳第一百一《張居正傳》，頁5652。

〔註9〕《萬曆野獲編》卷九「江陵震主」條，頁37。

〔註10〕《萬曆十五年》，頁32。

〔註11〕《神宗實錄》卷一八四，萬曆十五年三月壬寅。

〔註12〕《明史》卷二十本紀第二十神宗一，頁268。《明史紀事本末》云：「萬曆十年八月丙申，皇元子生。」（卷六十七第九冊頁110）。

妃雖賢，所生爲次子，而恭妃誕育元子，主鬯承祧，顧反令居下耶，乞收回成命，首進恭妃，次及貴妃。」皇帝爲之震怒，謫降二人，但也不得不表態：「我朝立儲自有成憲，朕豈敢以私意壞公論耶？」此後廷臣屢次請求冊立東宮，以繫宗社，萬曆帝也總以長子幼弱爲辭。萬曆十八年，迫於群臣之請，神宗傳諭：「建儲之禮，當於明年傳立，廷臣無復奏擾，如有復請，直踰十五歲。」這道旨意本就不近情理，既有意冊立，又何必在意群臣奏請，而且群臣之奏也都是爲了江山社稷。但爲了避免給予萬曆帝藉口，萬曆十九年自春及秋群臣曾無言及者。直至當年十月，工部主事張有德請備東宮儀仗，次輔許國乃曰：「小臣尚以建儲請，吾輩不一言，可乎？」倉卒具疏。萬曆帝便以此爲藉口，暫緩冊立。這已經迹近無賴了。萬曆二十一年春，輔臣王錫爵再次請建東宮，萬曆帝轉而主張皇長子、皇三子、皇五子並封爲王，等數年後皇后無出再行冊立。群臣紛紛力爭，此事因而作罷。建儲難爭，群臣轉而爭皇長子之出閣與冠禮。至萬曆二十二年二月，皇長子始出閣講學。萬曆二十九年十月，經廷臣力爭，在多次反覆之後，皇長子始冊立爲太子，同時冊封福王、瑞王、惠王、桂王。事件至此本已平息，但萬曆三十一年十一月，妖書案又起：「有蜚語曰續憂危竑議，凡三百餘言，謂東宮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寓日後改易之意。」「其書一夕間自宮門迄於衢巷皆遍。厥明，舉朝失色，莫敢言。」此書不能不讓人們對太子的地位再生疑慮，並引起群臣內訌。此後，群臣又爭福王之國、太子開講。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己丑，又有「錦衣衛百戶王日乾訐奏姦人孔學與皇貴妃宮中內侍姜、龐、劉諸人請妖人王子詔詛咒皇太子，刊木像聖母、皇上，釘其目，又約趙思聖在東宮侍衛，帶刀行刺，語多涉鄭貴妃、福王。」萬曆四十三年五月，「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棗木棍撞入慈慶宮，打傷守門內官，直至殿簷下被執。」梃擊之案起，又掀起一場更大的風波。直至萬曆四十八年，神宗去世，太子方在楊漣、左光斗和內侍王安的護持下即位〔註13〕。

爭國本自萬曆十四年始，中間糾纏著請立太子、三王並封、請皇長子出閣、請皇長子冠婚、憂危竑議案、續憂危竑議案、梃擊案等，餘波連綿不絕，移宮、紅丸二案及天啓閹禍都與此相關，甚至延及南明，實在是影響巨大而深遠。廷臣爭國本是根據立長不立賢的建儲原則與明朝定例，同時也擔心貴

〔註13〕爭國本參見《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七，梃擊案參見《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妃惑主、外戚專橫。而當萬曆帝屢次找藉口拖延立儲，就使眾臣更加相信萬曆帝確有廢長立幼之意，並認爲是貴妃指使，正如王錫爵所言：「去年之命既改於今年，則焉知今年之命不改於他日。夫人情惟無疑則已，疑心一生，則將究及宮闈之隱情，慮及千萬世之流禍。」〔註 14〕這種猜疑使得萬曆帝極爲惱怒。當然，猜疑並非無端，萬曆帝明顯地冷落皇長子，寵愛鄭貴妃及皇三子，因此他並非沒有冊立皇三子之心，可能他內心也處於自己的愛憎與祖宗成憲的矛盾之中。當朝野洶洶、群情疑懼之時，萬曆帝本應開誠布公地立儲、開閣、冠婚，消除群臣的疑慮，而不應與廷臣對立；而廷臣的勸諫也應該更有策略一些，不應言過其辭，甚至萬般猜測，令皇帝不堪。但事實上，雙方都墮入了惡性循環：臣下爭論時不免言詞激烈，而皇帝剛愎自用、威權自主、藉口百出，於是臣下爭之愈急，皇帝也愈加倔強。朝事由此大壞。

國本案的根本是皇權與封建道德的不統一：臣下固然應忠君，而君是封建統治秩序的象徵，因此皇帝也應遵循封建傳統準則。當臣下認爲皇帝違背封建政治原則與祖宗成憲，就應據理力爭，所以忠君的本質是忠於封建倫理與政治體系，皇帝也不能肆行無忌，這就避免皇權的過度膨脹，實現君臣制衡。而在爭國本中君臣均未實現充分的溝通，雙方的意志都非常堅定，皇帝以貶官削籍來發泄，而群臣則以不斷的上疏來抗爭，鬥爭激烈，君臣制衡實際已經轉化爲君臣對抗。爭國本的影響極其深遠，一是間接導致萬曆怠政，二是導致君臣否隔。萬曆怠政據樊樹志認爲，最主要的原因是神宗「長期以來耽於酒色，以致疾病纏身，使他對於日理萬機，感到力不從心。非不爲也，是不能也。所謂怠於臨朝，並非不理朝政的同義語，而且有一個隨著健康狀況逐步惡化而不斷加劇的過程」〔註 15〕；而據黃仁宇認爲，這是對於朝臣的一種消極對抗：「其動機是出於一種報復的意念，因爲他的文官不容許他廢長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長子常洛爲太子。這一願望不能實現，遂使他心愛的女人鄭貴妃爲之悒鬱寡歡。另外一個原因，則是在張居正事件以後，他明白了別人也和他一樣，一身而具有『陰』、『陽』的兩重性。有『陽』則有『陰』，既有道德倫理，就有私心貪欲。這種『陰』也決非人世間的力量所能加以消滅的。於是，他既不強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張，也不反對臣僚的意見，

〔註 14〕《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七，頁 115。

〔註 15〕樊樹志《萬曆傳》頁 365。萬曆是怠於朝政，忙於斂財，所以僅從健康原因考察並不準確。

而是對這一切漠然置之。」〔註 16〕不管如何，萬曆怠政的惡果都是非常嚴重的，一方面他對朝廷中的黨爭視而不見，甚至拉一派打一派，企圖利用黨爭轉移臣下的視線，避免臣下一致與他對抗；另一方面他放鬆對朝政的監控，導致官員玩忽職守，不關心民瘼。當時官員缺員嚴重，廷臣屢次請求增補，神宗就是不發布命令，致使政府機構無法正常運轉。君臣否隔一方面表現在皇帝厭惡臣下：大臣們針對國本案與萬曆帝的過失進行無休止的諫諍，令萬曆帝感到厭煩，並懷疑廷臣是在賣直沽名，故而奏疏大部留中不發；另一方面表現爲臣下不信任皇帝，如神宗本已答應冊立太子，但又藉故拖延，引起臣子疑慮。臣子們按儒家道德要求對皇帝進行規勸，而神宗卻肆意打擊，令大臣們大爲不滿。凡此種種都導致朝政日非，帝國在衰敗的道路上越行越遠。加之萬曆帝貪婪成性，礦監稅使四出，社會激蕩，民窮財盡〔註 17〕。即以萬曆三大征而言，看似明王朝最終大獲全勝，但從中恰恰反映明朝的政治、軍事、經濟都潛伏著巨大的憂患。所以後人評價萬曆帝：「因循牽制，晏處深宮，綱紀廢弛，君臣否隔。於是小人好權趨利者馳騖追逐，與名節之士爲仇讎，門戶紛然角立，馴至悾、慤，邪黨滋蔓。在廷正類無深識遠慮以折其機牙，而不勝忿激，交相攻訐。以致人主蓄疑，賢奸雜用，潰敗決裂，不可振救。」並深刻地總結說：「明之亡，實於神宗。」〔註 18〕

另一方面，萬曆朝由於境外白銀的大量輸入以及政府對商品經濟壓制的

〔註 16〕《萬曆十五年》頁 79。黃仁宇對萬曆帝頗抱同情之心。筆者以爲，這種對於歷史人物內心世界的分析一方面有助於我們理解歷史眞相；另一方面由於歷史信息的缺乏，也有許多揣測與想像，應當愼重。由於歷史的複雜性，對於萬曆帝的評價也極爲複雜：一方面，作爲皇帝，萬曆帝應該明白自己的責任，這種責任與他的權力和重擔是相聯的，豈能擁有權力，爲所欲爲，而不與群臣同心協力，履行自己的職責？如果說皇帝是人，也有私心，因此允許他不理朝政，那麼是否官員貪污也是可以理解的呢？另一方面，萬曆帝與群臣間的衝突深刻反映了明朝乃至整個封建社會君權與臣權的矛盾，當萬曆帝不能充分行使自己的意志，就企圖以怠政的方式要挾文官集團，而文官集團始終不退讓，雙方的消極制衡往往就意味著行政效率的低下。所以萬曆帝的行爲邏輯既應從其個人的心理世界、生活環境來分析，也應從整個政治生態、權力架構來分析。

〔註 17〕這裡取的是通說，但是晚明的經濟形勢比較複雜，萬曆帝固然派出許多礦監稅使，以充實內庫，但造成明末民窮財盡的還是畸型的財政制度、愈演愈烈的土地兼併、水利失修與大範圍水旱災害。

〔註 18〕《明史》卷二十一本紀第二十一贊，頁 294。

削弱，商品經濟畸型繁榮〔註 19〕，加之封建政治與思想控制的減弱，世風競於奢靡。如《萬曆野獲編》記載：「在外士人妻女，相沿襲用袍帶，固天下通弊。若京師則異極矣，至賤如長班，至穢如教坊，其婦外出，莫不首戴珠箍，身被文繡，一切白澤麒麟、飛魚、坐蟒，靡不有之，且乘坐肩輿，揭簾露面，與閣部公卿交錯於康衢，前驅既不呵止，大老亦不詰責，眞天地間大災孽。」〔註 20〕並說：「友人金赤城太守，家無儋石，貌亦甚寢，每過人室，則十步之外，香氣逆鼻，冰紈霧縠，窮極奢靡。至以中金爲薰籠，又爲溺器，而作吏頗清白，第負鄉人債數千，不能償耳。」〔註 21〕背負巨債也要窮奢極侈，這就可憐又可笑了。奢靡的風氣正反映了欲望的膨脹與社會的腐化。神宗便非常貪婪，委派礦監稅使，又開皇店，與民爭利，當國家危急，眾臣請發內帑以助軍餉，又吝嗇不與。在朝諸臣亦貪污受賄，錢權交易已成爲公開的秘密。上行下效，士大夫黷貨無厭，而「大璫用事者，其貪墨或十倍於縉紳，而江南富僧，蓄貲鉅萬，瓶缽之餘，至儕程、卓。」〔註 22〕積聚錢財之餘，他們瘋狂地荒淫享樂，皇帝尚且沉溺於酒色，張居正也「以餌房中藥過多，毒發於首，冬月遂不禦貂帽」〔註 23〕，遑論他人。何良俊便說：「西北士大夫飲酒皆用伎樂，余偶言及之，朱子價曰：『馬西玄丁憂回去，亦與娼家飲酒』」〔註 24〕因此當時「娼妓布滿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千百計，其他窮州僻邑，在在有之。」〔註 25〕娼妓而外，京師小唱盛行，「幾如西晉太康」，「其豔而慧者，類爲要津所據，斷袖分桃之際，賚以酒貲仕牒，即充功曹，加納候選，突而弁兮，旋拜丞簿而辭所歡矣。」〔註 26〕同時男色「至於習尚成俗，如京師小唱、閩中契弟之外，則得志士人致孌童爲廝役，鍾情年少，狎麗豎若友昆，

〔註 19〕對於明末商品經濟的繁榮，有研究者曾名之爲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由於此問題涉及較廣，本書不擬論述，但我認爲萬曆朝商業繁興是建立在江南地窄人稠，農業生產力過剩的基礎上，主要也是紡織、冶煉等封建社會傳統手工業的繁榮，雖然商業意識上升，商人群體強大，但社會生產力在根本上並沒有很大提高，因而不具有太多歷史進步性。

〔註 20〕《萬曆野獲編》卷五「服色之僭」條，頁 148。

〔註 21〕《萬曆野獲編》卷十二「士大夫華整」條，頁 316。

〔註 22〕《萬曆野獲編》卷八「宰相黷貨」條，頁 210。

〔註 23〕《萬曆野獲編》卷九「貂帽腰輿」條，頁 231。

〔註 24〕《四友齋叢說摘抄》之三，《叢書集成初編》第 2810 冊。

〔註 25〕謝肇淛《五雜俎》卷八，頁 225，中華書局 1959。

〔註 26〕《萬曆野獲編》卷二十四「小唱」條，頁 621。

盛於江南而漸染於中原，至今金陵坊曲有時名者，競以此道博遊堶愛寵，女伴中相誇相謔以爲佳事。」〔註 27〕《金瓶梅》中所描繪的官商勾結、追逐金錢、荒淫無恥的社會畫卷正是晚明的眞實寫照，正所謂「人情以放蕩爲快，世風以侈糜相高」〔註 28〕。

萬曆怠政、朝廷黨爭、經濟繁榮、世風靡爛等又無不對士風有重大影響。「在萬曆皇帝御宇的 48 年中，特別到了後期，大臣們已經看透了中樞無復具有領導全局的能力，也就不得不以消極敷衍的態度來應付局面。這類態度類似疫氣，很快就在文官中流傳，使忠於職守者缺乏信心，貪污腐敗者更加有機可乘。這種不景氣的趨勢愈演愈烈，使整個王朝走到了崩潰的邊緣。」〔註 29〕一方面由於中央政權的向心力減弱，封建正統儒家的思想統治地位下降，許多官員、士子面對衰世卻又無力改變，心情苦悶，只能縱情酒色，逃入佛禪〔註 30〕；另一方面，相當一部分士人、官員如東林黨爲了力挽狂瀾，在思想上努力強化封建道德以挽回頹風，在政治上要求整飭吏治，懲辦貪污。「他們的理想是，精神上的領導力量可以在皇帝的寶座之外建樹。他們從小熟讀《四書》和朱熹的注釋，確認一個有教養的君子決無消極退讓和放棄職責的可能，需要的是自強不息的奮鬥。」〔註 31〕

萬曆時期，泰州學派將王陽明、王艮的思想進一步發揮，如何心隱肯定人欲，認爲人欲出於人的天性：「性而味，性而色，性而聲，性而安逸，性也。乘乎其欲也，而命則爲之御焉。」〔註 32〕李贄則鮮明地提出了童心說，並指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後其心乃見，若無私，則無心矣。」〔註 33〕這無疑是對封建傳統思想的挑戰。李贄這些離經叛道的言論對當時士人的影響很大，如袁宏道在拜會李贄後，「始知一向掇拾陳言，株守俗見，死於古人語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鴻毛之遇順風，巨魚之縱大

〔註 27〕《萬曆野獲編》卷二十四「男色之靡」條，頁 622。
〔註 28〕張瀚《松窗夢語》卷七，頁 139，中華書局 1985。
〔註 29〕《萬曆十五年》，頁 82。
〔註 30〕需要指出的是世風靡爛與文人的放蕩自正統年間便逐漸發展，只不過在晚明得到了充分的展現。《萬曆野獲編》中云：「國朝士風之敝，浸淫於正統，而糜潰於成化。……至憲宗朝萬安居外，萬妃居內，士習遂大壞。」（卷二十一「士人無賴」條，頁 541）。
〔註 31〕《萬曆十五年》，頁 82。
〔註 32〕《何心隱集》卷二，頁 40，中華書局 1960。
〔註 33〕《藏書》卷三二《德業儒臣後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